# 济南市基础教育质量增值评价的实践探索与反思

摘　要：增值评价“为了发展而评价、借助评价促发展”的理念满足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诉求。研究结合济南市基础教育质量增值评价实践，提出了增值评价的价值意蕴，介绍了济南市的具体做法，讨论了影响增值评价赋能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要素，即区域支持的情景结构营造了有利于增值评价实施的政策环境和氛围，其效应往往间接产生；校长作为教师人际互动中的“重要他者”，其数据主导行为是重要推力；教师作为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核心，其数据智慧是关键拉力。三者共同发力，新的价值平衡的评价生态得以构建。

关键词：基础教育；增值评价；教育质量；评价育人

增值评价是建立在学校可以增加“价值”到学生的学习成就中的假设之上的，它通过衡量学生在接受一段时间的学校教育后发生的变化来关注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要素。我国对增值评价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地区，90年代初期在大陆教育界获得关注。进入21世纪，增值评价研究成果日益增加，我国基础教育迈入增值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本文在明确教育质量增值评价价值意蕴的基础上，介绍济南的实践探索，并讨论增值评价赋能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以期为增值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教育质量增值评价的价值意蕴

教育改革愈是进入深水区，就愈要重视高质量内涵发展，教育评价的重要作用也就愈发凸显。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提出“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增值评价作为重视过程性和发展性的形成性评价，其所倡导的“为了发展而评价、借助评价促发展”的理念满足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诉求。尽管已有研究积累了一定的学理成果和理论基础，但一方面，增值评价实践尚存“重方法、轻结果”“重结果、轻运用”的倾向，评价结果难以应用于改进学校教学与管理实践；另一方面，国内外都未见有具体研究证明能利用增值评价来改进学校教学和管理，而不合理的应用会造成压抑师生的生命活力、弱化人的生存价值的现象。［2］

尽管与终结性评价相比，增值评价具有关注“增加值”与“净效应”等工具性优势，但其只是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工具之一而非最终目的，不能超越教育目的成为师生的普遍追求。正如比斯塔所言，“（评价）产生的结果是否是教育本身的追求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对该问题的评判不能以工具性价值为基础，而应该由终极性价值来决定”。［3］所谓“终极性价值”，即能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学校教育。增值评价的最终价值归宿应该是基于对“何谓有效的学校教育”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将评价结果运用于改进学校教育教学与管理实践中。济南市基础教育质量增值评价以学生发展为出发点，以学校效能、教师改进为落脚点，不仅关注学生个体进步，更是以教育质量优质均衡为目标关注全体学生发展。依托增值评价，促进学校教育向“生本位”理念的价值转向，正是济南市增值评价实践紧紧扣住的价值底色。

二、济南市基础教育质量增值评价的实践

济南市于2020年启动初中生综合素养增值评价项目，分别在初一入学、初一期末、初二期末以及中考四个时间节点对市域内部分区域2020年秋季入学的学生的综合素养发展状况进行增值评价。秉持着评价育人的基本理念，以健全评价长效培训机制、“市—县（区）—校”三级评价管理机制、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评价实施机制以及多主体参与的评价结果运用机制为抓手，形成了本土化的增值评价实践模式，以促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

01

锚定评价育人理念，建立评价长效培训机制

《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在关注教育评价选才之功的同时，更加强调评价的育人之道。然而长期以来，受古代科举考试思想和人才选拔机制的深刻影响，教育评价的选才之功在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始终难以实现从“证明”向“改进”的根本转变。因此，建立评价长效培训机制，从根本上扭转学校和教师的评价理念，树立评价育人导向，是发挥增值评价“不比基础比进步，不比背景比努力”工具优势的必要前提。采用“分主题、分主体”的方式，在增值评价实施的不同阶段开展系列培训、典型案例分享活动。第一，明确开展增值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区域教育公平，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引导学校及教师既不能对增值评价视而不见，又不能盲目排斥。第二，引导学校及教师在关注学生学习结果的同时， 重视学生学习过程。终结性评价往往只能呈现学生学习的起点或终点，难以体现学生从起点到终点的过程。增值评价作为一种过程性评价，恰恰填补上了这一空缺，使了解学生成长全过程成为可能。因而，增值评价与其他评价方式在本质目的上是一致的，它们在促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应使学校及教师正确理解增值评价基本原理，客观、理性看待增值评价的优势与局限，将增值评价与多元评价方式结合使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第三，不忽视增值评价的“证明”功能，但更强调增值评价的“改进”价值。增值评价的终点并非仅仅是“证明”学校、教师或学生在某一阶段内的努力与进步程度，更是为学校、教师和学生提供“改进”的空间。济南市依托长效培训机制，搭建增值评价交流平台，通过优化、简化增值评价数据，指导学校及教师正确理解数据、准确运用数据，将改进的主动权还给学校及教师。

02

关注师生协同增值，健全三级评价管理机制

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认为，评价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过程，而是参与评价的所有人相互作用形成共同心理建构的过程。［4］然而，一方面，受宏观的数据运用观的影响，政策执行者往往是评价的主体，学校及教师作为被评价和干预的对象常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5］另一方面，由于增值评价技术与模型的专业性与复杂性较高，学校及教师基于数据改进教学与管理实践的能力较弱，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被弱化，导致教学的主客体分离。济南市增值评价关注教师和学生双主体的变化，通过健全“市—县（区）—校”三级评价管理机制，明确各层级、各主体的分工与职责，以“市级引领—县（区）统筹—学校研究—教师运用”的思路，一方面加强增值评价组织实施的严谨性与连贯性，另一方面开展不同主体主导的评价结果运用实践，使增值评价实现从侧重学校、教师管理转向侧重师生共同发展，致力于提升教师的教学胜任力和学生的综合素养。

03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创新增值评价实施机制

据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和《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2021年修订版）》等文件，结合区域教育发展需求与实际，济南市构建了增值评价指标体系：学校层面包含办学方向、课程教学、学校管理、学生发展四个维度9个指标；学生层面涵盖人口学基本信息、品德发展水平、身心健康状况、艺术素养、劳动与社会实践、学业发展水平六个维度31个指标，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增值状况，还关注德体美劳四育的增值状况。据此开发增值评价工具。一是校长及学生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由成熟量表和自编问卷构成；二是根据学科课程标准研制学业发展水平测试工具，主要包括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和生物学。二者均需预测试，通过测量学信效度指标测试后方可投入使用。运用MLWin、SPSS分析软件，将通过以上定量方式获取的学生数据进行增值分析，总结学生本学年同比上学年的进步（或退步）幅度。此外，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道德实践而非技术事业，评价数据解释教育活动有其自身局限性，因此，济南市还根据定量分析结果，进一步设计评价观察量表、师生访谈提纲，就某一主题或问题开展质性研究，全面、动态、真实、客观地呈现学生综合素养的增值发展状况，为学校教育由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提供可参考路径，赋予增值评价以人文关怀与教育温度。

04

发挥评价改进功能，完善结果反馈运用机制

不可否认，增值评价技术或许能够基于特定指标呈现教师的教学效果优劣，但难以体现教师的教学投入与教学风格差异；增值评价模型或许能够解释学生的努力与进步程度，却无法彰显教育互动中的非因果特质；增值评价结果或许能够告诉我们哪些因素曾经有效，但不能告诉我们哪些因素将来会有效。因而，济南市增值评价并不满足于教学效能问责，还希望通过完善增值评价结果反馈运用机制， 系统性、针对性地帮助师生定位具体问题，不断完善教育教学体验。一是以提升学校效能为重点，采用“分阶段、分对象”的方式进行区县层面的评价结果反馈，将学校分为基础好且进步明显、基础好但退步明显、基础弱但进步明显、基础弱且退步明显四类， 系统性归因，针对性督促落实。二是以发现教师典型做法、经验为重点，分别从班级、学科教研等方面进行学校层面的评价结果挖掘，总结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点与敏感点。三是以关注学生个体为重点，采用“影响因素分析、质性调研辅助”的思路，对学生群体特征进行画像，对学生的个性化差异进行深描，以找寻优秀学生的瓶颈点、问题学生的突破点。

三、讨论与反思

增值评价在学校教育实践中不应止步于判断价值——依据一定的准则对教育活动和现象进行好坏、优劣及其程度的判断——还应不断发现教育活动中蕴含的新价值、实现教育价值的新增值。济南市增值评价项目基于评价育人的核心立场，牢牢把握增值评价的价值判断、价值发现与价值创造的特质，探索出了本土化的增值评价实践模式。然而，无论是长效培训机制、三级管理机制还是评价实施机制，抑或是评价结果反馈运用机制，增值评价若要科学有效开展，赋能学校教育质量提升，会受到区域、学校及教师三重因素的巨大影响。要以学校校长的数据主导为推力，教师的数据智慧提升为拉力，创造新的价值平衡的评价生态，以促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图1）。

01

区域的增值评价情景结构

增值评价的重点并不在于证据数量的多寡，也不在于技术模型的复杂，而在于评价链条中的证明含量与证明增量，构建积极且良性的评价生态。在增值评价开始前，应明确增值评价目标、标准体系与当地教育发展情况的契合点。教育的对象是全面的人，是处在丰富环境中的人，是担负着各种责任的具体的人。师生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即便是为了达成相同的目标，评价技术与方法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即便是在同一评价维度中，对不同区域、学校、学生的评价内容与重点也会有所差异；即便是采用相同的评价技术，对评价结果的分析与运用方式也会各有特色。因此，增值评价目标、评价内容与技术方法的选择都应建立在对区域教育发展实际、对师生“具体个人”的深刻考量之上，这样的评价才能得到被评价者认同，评价结果运用于 改进学校教育教学方能成为可能。

在增值评价过程中，应重点寻找基于学校特点的增值敏感点。一方面，尽管学校教育质量受到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但应对增值评价数据抽丝剥茧，尝试发现影响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例如，济南市分别将不同因素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做回归分析，发现在众多显著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因素中，创新精神每提升1个单位，学生的学业成绩会提升47.095分，远高于其他因素。这提醒教师如果重视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教学质量或许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应对发展水平相近的学校进行归纳总结，剖析影响不同类型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深层要素，聚焦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敏感点，提高增值评价的针对性、评价结果运用的有效性。例如，在参与济南增值评价的学校中，既有城市学校，也有农村学校，分析发现两类学校在促进学生素养实现“正增值”的关键要素上存在差异。再如，即便是在教育教学水平相当的城市学校中， 影响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也有所差异。

在增值评价结果运用时，应始终坚守增值评价的基本伦理，凸显增值评价的学生立场。应通过梳理数据、优化数据、简化数据构建本区域、各学校的数据资源库，使增值评价数据成体系、好管理、易分析，更好地服务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决策，服务学生综合素养全面发展。

02

校长的数据主导

正如本项目中一位校长指出：“校长不仅是权力，更是责任，很多时候一线教师成长的壁垒可能恰恰是校长的眼界不够宽、思维不够深、领导不够力度造成的。”校长作为教师在人际互动中的“重要他者”，其数据处理行为深刻影响着学校教师对增值评价的认同程度、理解深度以及运用效度。因此，能否保证评价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能否将评价结果运用于改进学校教育教学、实现从“走近” 到“走进”增值评价的根本性转变，校长能否正确地处理数据是关键。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校长使用数据的活动，是不断改进的领导过程，其核心行为主要有五个维度。一是构建愿景，校长有必要将增值评价数据使用的目标和期望以足够详细的方式传达给教师，与教师一起将数据使用的愿景、目标和标准与学校教育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并落实到行动。二是提供个性化支持，校长应作为引导者、鼓励者，为教师参与增值评价数据使用制定个性化标准、提供针对性指导、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三是开展分布式领导，学校对增值评价数据的使用应当 是团队的集体活动而非校长的个人专权，校长有必要借助数据的公开与教师共享权力，培养教师数据运用的主人翁意识，赋予教师基于增值评价数据、专业知识的决策自主权。四是智力激发，这是校长发展学校教师数据运用能力的重要策略。校长需要认真考虑指导本校教师的内容和方式，通过组建数据团队等方式促进学校教师之间的知识共享、智慧众筹，以提高教师数据运用的自我效能感。五是创建数据文化，这是促进学校整体发展的前提，也是校长数据主导成功的关键。校长应立足长远，致力于让数据使用成为教师的习惯，以营造发展而非问责取向的数据文化。

03

教师的数据智慧

教师是教育的关键，增值评价赋能学校教育质量提升本质上是谋求教师智慧与评价数据的最佳融合。教师的数据智慧绝非特指数据分析能力或教学能力，而是高级的专业综合能力，是教师将数据符号转化为与教育教学目标相关联的信息，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教学经验和教学情境等，将其运用于解决现实的学校教育教学与管理问题的大智慧。［6］不可否认的现实是，目前多数教师由于缺乏“数据智慧”而失去运用数据的主动权，增值评价数据非但难以驱动精准教学与管理、助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反而成为教师的沉重负担。主要表现在， 第一，教师对增值评价数据运用于教学与管理不甚了了，将增值评价的作用拘泥于评定教师绩效、学生行为表现，较少用于改进教学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第二，教师尚存片面关注学生学业成绩的思维定式，增值评价赋能学校教育质量提升存在以偏概全的局限性；第三，教师缺乏解读和分析数据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无法准确理解增值评价数据图表， 且缺乏将不同种类、不同维度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的能力。要打通增值评价赋能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最后一公里”，一方面，应不断优化增值评价数据呈现形式，赋予教师及时获取、准确理解增值评价数据的权利，鼓励教师用“微数据分析”解决日常教学“微问题”，将数据运用与个人工作实际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诸多研究表明，教师较低的自我效能感、焦虑情绪以及对数据指导教学实践价值的消极信念均会阻碍教师数据智慧的形成，因而应努力改变教师对增值评价“高大上”的认识误区，打破教师“唯分数”“唯升学”的思维定式，通过建立提升教师评价素养的培训制度，开展增值评价的专题座谈、学术研讨、专家培训等让教师理解增值评价的基本理念，掌握数据运用的基本方法与技能，持续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热情。

诚然，增值评价模型的专业性及复杂性决定了当前以教师为主导开展增值评价不太现实，但在区域情景结构安排、学校数据主导的助力下，教师可以在增值评价的大数据中发现规律、识别问题，对包含情景信息的小样本数据进行深入描述，这能够弥补增值评价由于样本量大而难以深挖数据背后真实教学情境的问题，也能够实现增值评价最终的价值归宿。正如比斯塔所说：“教育专业者的作用是利用研究结果使问题解决变得更加明智，这不仅涉及对教育方法和技术的深思和判断，同时涉及对教育目的的深思和判断。”［3］

四、结语

国内关于增值评价的研究已四十年有余，其“为了发展而评价、借助评价促发展”的价值理念、关注“增加值和净效应”的工具性优势被广为认可， 但评价内容缺少统一标准、评价技术模型复杂难理解、评价数据收集难度大、评价结果运用受限制等也是当前使增值评价发展陷入困境的不争事实。本文基于济南市增值评价的实践，认为增值评价促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是要牢牢把握增值评价的价值判断、价值发现与价值创造的特质，秉持评价育人的基本理念，通过健全评价长效培训机制、“市—县（区）—校”三级评价管理机制、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评价实施机制以及多主体参与的评价结果运用机制，理顺包含区域、学校和教师三重要素在内的发生机理，最终促进学校教育质量科学提升。此外应该认识到，在教育领域，有价值的东西并非都能被测量出来，可以测量的东西也并非均有价值。增值评价并非“万能钥匙”，难以实现所有评价目标，无法解决一切教育难题，“唯技术”“唯数据”将会使增值评价落入形而上的、形式主义的窠臼。增值评价的重点应在于以深化教育理念、改革评价机制为要旨，重塑教育主阵地秩序，加快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搜狐网2023-09-11